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3.006

# 大卫·路易斯模态实在论驳议

王聪,刘可怡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大卫·路易斯模态实在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提供一个相应的模态认识论说明。路易斯本人为了辩护他的模态认识论提出了两个论证:基于类比于数学的论证和基于理论功效的论证。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路易斯的这两个论证并不能实现他的目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则是路易斯使用的IBE方法,因为IBE并不是真理导向的方法,IBE背后也存在逻辑问题。

**关键词:**大卫·路易斯;模态实在论;模态认识论;超内涵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3-0043-08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模态哲学一直占据着分析哲学界形而上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从广义上来说,模态哲学包括模态形而上学、模态逻辑及其语义学,以及模态认识论。随着前两者经过半个世纪的长足发展,模态认识论也逐渐获得了相对清晰的研究论题。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发展,模态认识论者向我们说明了运用各种方式(如先验的方式、后验的方式以及椅验的方式等)去获得模态知识<sup>①</sup>的可行性,但本文并不准备对这些特殊的模态认识论(如基于可设想性的模态认识论、基于归纳的模态认识论以及基于反事实理论的模态认识论等等)进行分析,而是回溯到模态形而上学理论蓬勃发展时期,以路易斯(Lewis, D.)的模态理论为研究对象,来评估他的模态认识论,并据此讨论路易斯的模态实在论(Lewis's

Modal Realism, 简记为LMR)面临的主要难题。

本文将在第一部分重构路易斯模态认识论的两个论证,并指出这两个论证的一些预设;第二部分将指出这些论证所面临的问题或反例;而第三部分将进一步指出这些论证为什么不能支持路易斯的模态认识论,并说明在后模态时代中,我们理应仔细分析模态工具恰当性问题的迫切性。

## 一 路易斯模态认识论的两个论证

根据路易斯的模态实在论,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多重的、具体的可能世界,且这些世界与我们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具有物理可达性(physically reachability)关系。LMR自提出以来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20世纪的模态形而上学讨论中也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sup>②</sup>。同时,

收稿日期:2024-02-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2FZX087)

作者简介:王聪(1985—),男,河南商水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逻辑哲学研究。

<sup>①</sup>本文所关注的是形而上学模态知识的问题,即那些仅仅可能的和既非逻辑亦非数学的必然性知识,但出于简单性的考量,本文主要聚焦于路易斯的模态实在论以及他的模态认识论。而由于模态形而上学、模态逻辑及其语义学,以及模态认识论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在说明路易斯的模态认识论的地方也会涉及对路易斯的模态形而上学、模态逻辑及其语义学的概要说明。

<sup>②</sup>一般来说,模态实在论归属于模态形而上学。模态语义学会探讨模态语句的意义以及我们是如何理解它们的,对于这些模态语句来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模态逻辑系统和形式语义学进行处理。而这些模态语句是否需要一些形而上学预设?我们是否需要假设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来解释和说明这些语句?如果需要,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问题则属于模态形而上学的范畴,而路易斯的模态实在论则是预设了可能世界的存在。如果这些可能世界超出了现实世界的范围,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模态语句的真值?我们是否具有获得这些形而上学模态知识的认知官能或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模态知识,那么其范围又为何?这些问题则属于模态认识论的范畴(模态认识论对应两种表达:modal epistemology 和 the epistemology of modality,前者借助于模态性来分析知识的要件,属于知识论的范畴;后者主要说明获得模态知识的认知官能或方式以及模态知识的范围问题,属于模态哲学的范畴)。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虽然路易斯的模态认识论(Lewis's Epistemology of Modality;简记为LEM)是为了更好地支撑或辩护他的模态实在论或模态形而上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其作为一个单独的论题来仔细检视。

LMR 也受到了诸多的批评与质疑,而路易斯本人也对这些反驳做出了回应。如批评 LMR 会造成“过度膨胀的本体论”以及“跨世界等同”等等问题,路易斯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他认为其他世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同一类的东西,因此并不会造成“过度膨胀的本体论”。为了解决跨世界等同和一些其他问题,他提出了副本理论(counterpart theory)。但是一个最主要的难题则是认识论难题,即所谓的“不可置信的眼神”(incredulous stare)或“白眼丸”(blank stare),即承认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多重且具体的可能世界和可能事物,这件事和我们的日常直觉太相悖了,以至于很多人投来不可置信的眼神或白眼丸<sup>①</sup>。这个问题说的就是,如果存在着具体的多重世界,且它们与我们没有时空关联,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一件事的?我们又是如何知道有关这些具体可能世界的特征的?关于此难题相似的表述有贝纳塞拉夫难题(Benacerraf's problem, 1973)<sup>②</sup>、菲尔德-贝纳塞拉夫难题(Field-Benacerraf's problem)<sup>③</sup>,这两种表述主要集中在数学领域。一个更具概括性的版本则是皮考克(Peacocke, C.)的“整合性挑战”(the integration challenge),该挑战说的是,对于给定领域来说,如果你提出了某种形而上学理论,那么你也应该提供一个合理的认识论说明<sup>④</sup>。当然,路易斯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他提供了两个主要的论证去说明模态实在论的认识论问题。

### (一)基于与数学类比的论证

路易斯认为模态和数学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从而提出了“基于与数学类比的论证”(the argument based on the analogy with mathematics, 简记为 ABAM)。二者最根本的相似点是它们的先验本质<sup>⑤</sup>。如果你是一个数学柏拉图主义者,你会认为数学对象与我们之间并没有时空关联,也因此与我们之间没有物理可达性关系;数学对象虽然是抽象的,但却是物理上不可达的。路易斯的模态对象虽是具体的,但类似地同样为物理上不可达。因此,模态知识的获得类似于数学知识

的获得,也就是说,在认识论层面上它们有共同的来源。除此之外数学知识和模态知识在必然性方面也极其相似,如果数学或模态陈述为真,那么它们就必然为真<sup>⑥</sup>。那么,我们是如何获得这些数学知识呢?可能一个答案是,我们是通过先验的方式去获得这些知识的,但这个答案显然并不充分。这种回答至多只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依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排除一些方式去获得数学知识。除此之外,当我们质疑这种先验认识论的可靠性时,这种答案似乎也不能很好地说明。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模态认识论的说明。即使我们可以给出某种“标准”来为模态知识划定范围,我们仍旧需要回答我们是如何获得模态知识的。如果数学实在论的认识论类似于模态实在论的认识论,那么我们依据这种“类似对称”关系就可以构造以下论证来说明模态实在论的认识论难题:

P1:数学实在论(柏拉图主义)的认识论面临着“贝纳塞拉夫难题”;

P2:如果数学知识的获得类似于模态知识的获得,那么数学知识获得当中的“贝纳塞拉夫难题”也会以一种方式迁移到模态知识的获得中,即,模态知识的获得也会面临着相似难题,如“整合性挑战”;

因此,C1:模态知识的获得也会面临相似的认识论难题。

当然,路易斯对于“贝纳塞拉夫难题”也给出了回应,并认为数学知识的获得可以依据一些真的数学原则,并通过保真推理的规则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数学知识。模态知识也可用同样的方式获得,即通过一些“真的模态原则”(路易斯所说的重组原则),再依据一些保真的推理就可以获得模态知识。但问题是,我们又是如何知道那些所谓的“真的数学原则”或“真的模态原则”为真的呢?同样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我们是通过先验的

<sup>①</sup>Lewis, D. "Possible Worlds", in Michael J. Loux (eds.), *The Possible and the Actual*,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84. and Lewis, D.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p. 133-135.

<sup>②</sup>Benacerraf, P. "Mathematical Truth",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3(70): 661-679.

<sup>③</sup>Field, H. *Realism, Mathematics, and Modal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p. 232-233.

<sup>④</sup>Peacocke, C. *Being Know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p. 1-3.

<sup>⑤</sup>由于本文只是聚焦于路易斯的模态实在论,因此不在此考虑以数学唯名论的立场去说明或“类比于”路易斯的模态实在论。

<sup>⑥</sup>Lewis, D.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Oxford: Blackwell, 1986, pp. 110-113.

方式知道的。但这个答案并没有回答这种先验的方式是否依靠了某种可靠的理智官能(显然,无论是数学对象还是具体可能世界,都不依靠我们的知觉官能),又或者是可靠的信念形成机制,这个答案只是给出一个粗粒度(coarse-grained)的回答,显然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如何获得相关的模态知识的。

总的来说,利用类比的方式并不能使我们走得更远,如果要精析路易斯的这个论证,我们也总能找到瑕疵,进而驳斥他所论证的结果,而一个根本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类比这个方法本身。相较于该论证,路易斯本人以及模态实在论的支持者在大多数场合会利用“基于理论效用的论证”(the argument based on theoretical utility,简记为 ABTU)来辩护他们的主张,这也是路易斯在《多重世界》开篇所提倡的论证。

## (二)基于理论效用的论证

一个更容易接受模态实在论或者说认为模态实在论为真的想法是,模态实在论或者说假定具体可能世界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更系统地“做哲学”,因为假定它们可以更好地解释或分析很多哲学概念以及哲学问题。正如路易斯所说:“如果我们预设模态实在论,那么可以使我们的哲学越来越简单。我把这当作是一个认为模态实在论为真的好理由,正如数学中集合论的效用是一个认为存在着集合的好理由一样。”<sup>①</sup>路易斯的《多重世界》一书中出现了多次相似说法,总的来说,具体可能世界存在的假定可以应用到逻辑哲学、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形而上学等领域的众多问题上,而且可以解决外延主义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学界经历“模态革命”的原因<sup>②</sup>。根据路易斯的说法,戴佛斯(Divers, J.)重构了 ABTU:

P3:如果本体论假定(设定具体可

能世界的存在)具有强大的功效,那么这给我们好理由相信它为真;

P4:如果一个信念具有好的被担保的理由,则该信念为知识;

P5:相信本体论假定的这些理由正在被担保;

P6:真正的模态实在论(路易斯的模态实在论)具有强大的理论功效;

因此,C2:我们知道真正的模态实在论(路易斯的模态实在论)为真<sup>③</sup>。

通过戴佛斯的重构可以使我们的更清晰地看到路易斯背后的想法,同时也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有效的论证结构。正如前述所说,由于集合论的强大功效,这给我们一个好理由相信存在着集合,同样的,由于模态实在论的强大功效,这也给我们一个好理由相信存在着具体可能世界。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除了接受具体可能世界的存在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而路易斯本人也是在比较了各种可能理论之后才做出的选择。确切地说,他认为模态实在论要比其他选择<sup>④</sup>更具有一些理论优点,比如统一性、简单性、解释力以及表达力等理论优点<sup>⑤</sup>。在这里,路易斯所使用的方法为最佳说明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简记为 IBE),即,对于给定被解释项来说,在相互竞争的理论当中挑选出最佳解释,对于该方法的讨论将在第三部分着重说明。

当我们询问为什么模态实在论或假定存在着具体可能世界有如此强大的理论功效?我们也可以以它的不可或缺性来说明,即“某理论具有强大的理论功效”至少蕴含了“它的不可或缺性”,仿照数学实在论的不可或缺性论证(the indispensability argument,简记为 IA)<sup>⑥</sup>并进而构造一个模态实在论的不可或缺性论证。我们首先检视一下

①Lewis, D.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Oxford: Blackwell, 1986, p. vii.

②Nathan Wildman. “From Modal to Post-Modal Metaphysics”, in Ricki Bliss & JTM Miller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etametaphys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71–82.

③Divers, J. *Possible World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51.

④如代用论(Ersatzism)方案,主要代表人物有斯托内克尔(Stalnaker, R.)和普兰丁格(Plantinga, A.)。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三种反实在论的选择:虚构主义、非认知主义以及错论。

⑤Lewis, D.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Oxford: Blackwell, 1986, pp. 3–5.

⑥在当代的数学哲学讨论中,柏拉图主义者以 IA 来辩护他们的主张,并认为存在着抽象的、客观的数学对象。IA 在哲学界的提出一般认为是由奎因最先提出的,而后经过他的学生普特南(H. Putnam)的强化,因此,学界也称呼 IA 为奎因-普特南不可或缺性论证(Quine-Putnam indispensability argument,简记为 QPIA)。详细参见:Putnam, H. *Philosophy of Logic*.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57. 数学实在论与数学唯名论围绕着 IA 或 QPIA 的论争在当代复兴了理性和经验论的论争。作者也曾专门撰写了讨论该论争的论文,即《奎因论数学对象的实在性》,《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 年第 9 期。

IA 的结构:

P7:数学对于经验科学是不可或缺的;

P8:如果数学对于经验科学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存在着数学对象;

因此,C3:存在着数学对象。

同样,我们的日常生活、科学实践中也充斥着大量的模态论说,除非你是极端的模态怀疑论者,否则,你会认可存在着模态论说这件事。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最好的科学理论包括模态理论<sup>①</sup>。模态实在论的不可或缺性论证可以构造如下:

P9:模态理论对于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最好的哲学理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P10:如果模态理论对于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最好的哲学理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存在着具体可能世界;

因此,C4:存在着具体可能世界。

而依据路易斯的理论,这里的不可或缺性应该指的是,如果不对这些具体可能世界进行量化处理,我们将无法建构一个具有强大理论优点的理论。正如前面所述,路易斯是在相互竞争的理论当中,以简单性、统一性和解释力等优点为判断标准,并进而认为只有模态实在论才能在众多的选择当中拔得头筹。通过戴佛斯的重构,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分析路易斯所提供的模态认识论理由,如果我们要评估这些论证,我们只要检视这些论证的前提的真值即可。下面我们将精析这些前提。

## 二 检视两个论证的前提

路易斯通过 ABAM 和 ABTU 来支持他的模态认识论,进而说明我们是可以获得有关具体可能世界的知识的。但前提是,这两个有效论证的前提要为真,这样我们才能通过保真的推理规则获得那些模态知识。

### (一) 质疑 ABAM 的前提

如前所述,如果模态知识的获得真的类似于数学知识的获得,那么我们将会得到 C1。毕竟数

学对象或具体可能世界与我们之间并没有物理可达性关系,在“贝纳塞拉夫难题”的表述中,虽然贝纳塞拉夫依据的是“数学对象与我们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关联”,即使是现在知识的因果理论已然被放弃,但我们仍需要说明使真者与真之载体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数学中的某个理论(如 ZFC),我们是如何知道它的真假?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多具有相关的一致性证明。但问题是,这些集合论一致性证明所表达的真假问题要远比 ZFC 本身更具有争议性,因为这些理论需要设定物理上不可达的基数之类的对象的存在<sup>②</sup>。当面对着路易斯所说的具体可能世界时,这个难题尤为严峻,正如皮考克所说,“整合性挑战”对于某些形而上学理论来说是难以跨越的鸿沟。而对于很多数学家以及物理学家来说,他们也并不认为存在着数学对象,而只是认为数学是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的工具。“数学是特别适合于处理任何种类的抽象概念的工具,在这个领域内,它的力量是没有限制的。”<sup>③</sup>明显的是,物理学家坚持认为数学只是一个有用的装置,尽管要对这些数学对象进行量化,但是,他们仍然反对对这些数学对象做出本体论的承诺。据此我们可以说,即使是数学知识的获得类似于模态知识的获得,我们仍旧可以对具体可能世界不做出任何承诺。兹构造论证如下:

P11:数学知识的获得并不蕴含对数学对象的承诺;

P12:如果模态知识的获得类似于数学知识的获得,那么两者对其研究对象的承诺与否将相同;

P13:数学知识的获得类似于模态知识的获得;

因此,C5:模态知识的获得并不蕴含对具体可能世界的承诺。

当面对上述的认知难题时,路易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力(imagination)这一官能获得绝大多数的模态知识<sup>④</sup>。在做想象或思想实验时,我

<sup>①</sup>Otávio Bueno et al. “Modal Realism and Modal Epistemology: a Huge Gap”, in Eric Weber & Tim De Mey (eds.). *Modal Epistemology*, Berlin: Springer, 2004, pp. 93-106. and Scott Shalkowaki et al. “A Plea for a Modal Realist Epistemology”, *Acta Analytica*, 2000(24): 175-193.

<sup>②</sup>Otávio Bueno et al. “Modal Realism and Modal Epistemology: a Huge Gap”, in Eric Weber & Tim De Mey (eds.). *Modal Epistemology*, Berlin: Springer, 2004, pp. 96-97.

<sup>③</sup>Dirac, P. *The Principles of Quantum Mechan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viii.

<sup>④</sup>Lewis, D.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Oxford: Blackwell, 1986, pp. 113-115.

们会自主地把模态实在论的诸多原则(如重组原则等)加到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获得的经验知识上,以此来拟想出可能的情景来判断模态语句的真值。在路易斯看来,这种方法或官能之所以可靠,之所以能够提供我们关于模态领域的知识,就在于我们在想象中所运用的模态实在论的诸多原则,它们其实就是多重(可能)世界间的普遍真理。而路易斯这种说法的困难之处,就在于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原则就是多重(可能)世界间的普遍真理。毕竟,根据路易斯的模态实在论,我们和客观的其他多重世界之间既无时空亦无因果上的关联,那么,为何我们的想象官能或方法会碰巧掌握到了宰制客观多重世界的普遍真理呢?<sup>①</sup>如果模态实在论者不能说明为何这些原则为(普遍)真,那么获得模态知识的可靠性将受到影响。

依据路易斯的想法,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可靠的信念形成机制来获得模态知识呢?即使在我们不知道那些数学或模态原则为真情况下,只要我们有一个可靠的信念形成机制,我们会获得知识。当然,如果那些原则也为真,我们使用保真的推理规则即可以获得真的结论,并进而获得知识。对于这个策略来说,我们不会知道关于给定领域(数学或模态)的全部知识。事实上,对于给定领域来说,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全部知识。因为,对于表达算术的语言来说,只要使用的语言足够丰富,只要使用的数学和模态原则是一致的,根据哥德尔定理,其中总会有一些真的语句不能被这些原则演绎或证明。因此,由于上述二者知识的不完备性,我们获得这些领域的知识也会是不完备的<sup>②</sup>。但问题是,按照这种想法,如果这些原则不为真,那么所谓的信念形成机制也不会是可靠的。因此,运用类比的方法去辩护 LEM 并不能使我们走得更远,这可能也是路易斯为什么引入 ABTU 的原因。

## (二) 质疑 ABTU 的前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 ABAM 存在着一些

难题,那么,ABTU 真的如路易斯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很好地支持 LEM 吗?通过评估 ABTU 的前提,我们的发现可能会令路易斯失望。

戴佛斯的重构让我们看到路易斯论证的有效性,但是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发现 P3 为假。根据 P3,路易斯建构了一种蕴含关系,即,“满足相关理论优点这件事”蕴含了“该理论为真”。对于 P3 的前件来说,“一个给定假设在理论上有用”至少蕴含“该假设满足了相关理论优点”。因此,如果一个理论或假设具有解释力、统一性等理论优点,且在它们合理地例化这些优点时,我们有好理由偏爱或接受这个理论或假设。而“满足理由相关理论优点”这件事主要是实用层面上的而非认知层面上的,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假设只是告诉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的重要性,但是它们不需要告诉我们这个假设与世界之间的关联。例如,假定对于我们来说,给定假设的简单性向我们提供了好理由认为它为真,这件事只不过是假定人类中心主义的翻版”<sup>③</sup>。即使某理论满足了相关的理论优点,在实用的层面给予我们接受该理论的理由,但并不代表能给予我们好理由相信该理论为真<sup>④</sup>。一个对 P3 的经典的反例则是牛顿的经典力学,该理论很好地满足了路易斯所强调的那些理论优点,如简单性、统一性和解释力,但仍旧被我们证明为假(特别是在微观层面)。我们不仅不能从“满足相关理论优点”推出该理论为真,甚至是,“满足理论优点”和“被证明该理论为假”总是有支撑的关联,在科学哲学中,事实上这是我们对元归纳(meta-induction)<sup>⑤</sup>看法的悲观结果之一。

我们以“统一性”这个理论优点来说明。对于给定领域来说,我们总是期望能找到一个统一的理论去说明该领域的所有现象。确切地说,这源于我们本身的理想性倾向,而在哲学领域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这表现为我们总是会把哲学的原则凌驾于科学原则之上。“一个统一论<sup>⑥</sup>者总

①王文方:《Rosen 的模态虚构主义述评》,《台湾哲学研究》2005 年第 5 期。

②Otavio Bueno et al. “Modal Realism and Modal Epistemology: a Huge Gap”, in *Modal Epistemology*, Eric Weber & Tim De Mey eds. Berlin: Springer, 2004, pp. 98-100.

③Otavio Bueno et al. “Modal Realism and Modal Epistemology: a Huge Gap”, in Eric Weber & Tim De Mey (eds.), *Modal Epistemology*, Berlin: Springer, 2004, pp. 99.

④Van Fraassen, B. C.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pp. 19-23.

⑤在这里元归纳的意义主要是指:对归纳方法的评价。

⑥在这里我们应该清楚统一论与统一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就上述所说的“理想性倾向”来说,“统一性”蕴含“统一论”。至于二者之间的区别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为了使论文主题聚焦,作者将不准备在本文中花大篇幅去说明——作者注。

是假定人类的历史按照我们所发现的那样存在。现代很少有学者承认自己是一个统一论者,因为他们意识到信念、实践以及社会约定等总是随着时间而发生戏剧性的改变。”<sup>①</sup>统一论的这种解释模型有几个主要的特征:首先,这种方法论的运行首要的是一种哲学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活动;其次,它一般是从一些“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中去找到这种方法的历史演进证据,而不是关注科学家们对这种方法的贡献;再次,无论方法论信念作何改变,这些改变一定是基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之前的一些转变。基于元归纳的悲观看法,过去所有的科学理论,包括满足或平衡了这些理论优点的理论,最后都可能被证明为假<sup>②</sup>。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非经验的理论中,如弗雷格的逻辑主义,这些理论都具备了路易斯所提到的理论优点,但最后却因为它们的不一致性而被证明为假(在古典逻辑的假设下)。因此,P3的蕴含关系并不成立,这显示出ABTU虽然是一个有效的论证,但却不是一个健全的论证,因为P3为假。

前述我们构造了模态实在论的不可或缺性论证,那么这种方式能够支持LEM吗?我们需要检视P9的真值。P9向我们说明路易斯的具体可能世界存在标准:设定具体可能世界的不可或缺性。首先,我们要先说明“不可或缺性”真的能够给予我们好理由相信具体可能世界的存在吗?我们对具体可能世界的设定有可能只是为了更好地简单化我们的论说,把具体可能世界的设定当作是一种“语言的需要”,以此来提高语言的表达力。当我们对虚构对象进行量化处理时,如对“孙悟空”的量化,我们只是为了更加丰富我们的语言,对于虚构人物的量化也不必然带来我们对它们做出本体论的承诺,我们做的只是依据量词的逻辑意义,把虚构对象纳入量词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做出了量词承诺(quantifier commitment),而量词承诺并不蕴含本体论承诺<sup>③</sup>。当然,奎因会同意,虚构对象总是能够被消解掉。但不幸的是,这种改写并不总是适用,甚至在没有这种改写的情况下,甚至是当我们对某些对象的量化是不可或

缺时,如虚构人物,我们也总是能合理地对它们的本体论承诺进行反驳<sup>④</sup>。

再者说,在众多的存在标准中间,路易斯选择这个标准本身就是一件偶然性事实。而我们也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接受这种标准,接受不同的标准将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尽管某种实体对于我们最好的理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我们也不可避免要对这些实体进行量化,这仍旧不足以给我们对这些实体做出本体论承诺的理由。不只是虚构对象可以说明这个情况,应用于我们最好的物理理论的数学对象也可以说明这个情况。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具体可能世界的讨论,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我们一定要采用这种特殊的存在标准,因此我们也没有好理由一定相信P9为真。有人可能会说,路易斯通过诉诸“理论优点最大化”(IBE)挑选出了一个最佳理论——模态实在论,下面我们就来分析IBE到底能不能为LEM担保。

### 三 IBE真的能给予我们好理由相信LMR为真吗?

在当今众多的模态认识论方案中,如何挑选出一个最佳的理论,也会涉及以IBE的方法去辩护某种模态认识论方案。例如,比格斯(Biggs, S.)和威尔逊(Wilson, J.)在评估基于可设想性的模态认识论之后,便得出了基于最佳说明推理(IBE)的模态认识论才是我们的最佳理论,但范围只是限制在不可观察的科学实体<sup>⑤</sup>;费舍尔(Fischer, R.)以保守性、简单性以及处理异议的能力这三个优点评估了一些模态认识论方案,并认为“满足这三个理论优点”并不能给予我们好理由相信某种模态认识论为真,并且他认为“理论优点的满足”只是能够辩护我们对某种模态认识论的接受<sup>⑥</sup>。

借助于LMR具有的强大功效(即满足路易斯所说的理论优点),路易斯认为这给予我们好理由在众多的理论中挑选出最佳理论,并相信该

①Laudan, L. *Science and Hypothesis: Historical Essays on Scientific Methodology*. Dordrecht: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p. 6-7.

②Laudan, L. *Science and Hypothesis: Historical Essays on Scientific Methodology*. Dordrecht: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p. 15-18.

③就这一点上来看,阿祖尼和奎因之间有很大的分歧,有关阿祖尼对“量词承诺并不蕴含本体论承诺”的说明请参见:Azzouni, J. *Deflating Existential Consequence: A Case for Nomi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0-115.

④Melia, J. “On What There’s Not”, *Analysis*, 1995(55): 223-229.

⑤Biggs, S., Wilson, J. “Abduction versus Conceiving in Modal Epistemology”, *Synthese*, 2021(198): 2045-2076.

⑥Fischer, R. “Theory Selection in Modal Epistemolog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15(4): 381-395.

理论为真。根据前述所说,“某理论满足理论优点”并不蕴含“该理论为真”,而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 IBE 方法并不是真理导向 (truth-conducive) 的。哲学方法论的核心部分之一即是 IBE,在科学实践中,这种方法也大行其道。但是与科学相比,这种方法在哲学中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不同的。“让我们假设……哲学与科学的方法实质上相去不远。(哲学家们)在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起理论,然后他们基于理论的各种优点——解释力、简单性等等——去在经验上等值的多个理论中做出选择。……但……相比于科学,哲学的下场如何?答案是超级悲惨。我们的证据基础是极其荒凉的,大体上就只是直觉而已;我们没有任何好故事去说这些直觉与事实有关,我们也没有根据去认为理论优点的最大化(IBE)是真理导向的。”<sup>①</sup>毕比(Beebe, H.)进而指出了 IBE 方法的两个问题:首先,对于科学家们来说,IBE 是真理导向的方法,因为他们有归纳上的证据可以辩护这件事。但是对于哲学家们来说,他们缺乏这样的证据去说明“IBE 是真理导向的方法”,因为哲学家们的证据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所谓的直觉;其次,退一步来说,即使我们同意 IBE 推论中每一项“个别”优点(详见以下的说明)都是真理导向的,哲学家们对于“这些优点的重要性或权重(weights)有多大”这件事仍旧不能达成共识,这缘于哲学家们所依赖的资料(data,直觉)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问题。因此,由于缺乏一致的共识,他们也无法决断出哪一个理论才是最佳理论。

路易斯在选择模态实在论时所提供的理论优点有解释力、简单性、统一性以及表达力,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在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评估时,作为筛查器的理论优点清单远不止于此。除了上述费舍尔所说的“解决异议的能力”,还有逻辑一致性、非特设性、融贯性、保守性、清晰性、精确性、成果丰富性等,就上述所说的“解释力”优点本身就包括解释力的广度和解释力的强度,就“简单性”优点本身也包括本体论上的简单性和意识形态上的简单性,而且上述的清单并不是一个穷尽的清单<sup>②③④</sup>。因此,路易斯仅仅依据他所提到有限理

论优点,就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中挑选出最佳的理论——模态实在论,现在看来无疑有点草率。除此之外,更根本的问题在于 IBE 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只要我们对这些理论优点的权重和程距(range)赋予量化的数值,就可以计算各种理论的得分,进而挑选出得分最高的理论。但正如前述所说,哲学家们对于权重和程距的数值并不能达成一致,且哲学家们的证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直觉而已,那么结果就是无法计算或挑选出一个最佳理论。确切地说,上述的优点之中有些优点本身就含混不清且具有争议,如“非特设性”“解释力强度”,这两个模糊的理论优点往往会造成赋值的困难,从而流于任意;当我们使用“逻辑一致性”这个优点时,我们必定预设某种逻辑立场,因为这个理论优点对于相信矛盾句实际上为真的双面真理论者(dialetheists)普利斯特(Priest, G.)来说,可能并不重要或者只有很低的重要性。IBE 最大的困难可能还不是这几个问题,其中最糟的问题可能是 IBE 背后的逻辑问题。

哲学理论通常是使用日常语言叙述的,当我们用精细化的形式语言去分析哲学理论时,首先要决定的就是选择对于日常语言来说最佳的逻辑,或者说对于日常语言来说正确的逻辑,因为选择的逻辑不同,逻辑后承(logical consequence)(又或者逻辑衍推、逻辑蕴含)关系也不同。上述 IBE 中众多的理论优点都和逻辑后承有关系,如融贯性、保守性、解释力强度以及成果丰富性。对于保守性来说,为了决断出一个理论 T 是否和我们某些既有的看法相一致,我们需要从 T 逻辑地衍推出与那些既有看法有关看法;对于融贯性来说,为了说明 T 和某个理论融贯,我们需要证明它们在逻辑上不会共同衍推出矛盾;对于成果丰富性来说,为了说明 T 还可以解决其他问题,我们需要证明从 T 逻辑地衍推出它应用于该问题上的结果;对于解释力强度来说,为了要说明 T 可以解释某种直觉,我们需要证明 T 逻辑上蕴含该直觉,或者逻辑上高度支持该直觉。不幸的是,

<sup>①</sup>Beebe, H. “Philosophical Scepticism and the Aim of Philosoph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2018, 118(1): 4.

<sup>②</sup>Williamson, T. “Abductive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2016, 47(3-4): 263-280.

<sup>③</sup>Williamson, T. “Semantic Paradoxes and Abductive Methodology”, in Armour-Garb, Bradley (eds.), *Reflections on the Li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25-346.

<sup>④</sup>王文方:《形上学》,三民书局 2008 年版,第 51—53 页。

“对于日常语言来说正确的逻辑”正是当代哲学中未盖棺定论的问题。有的人(Priest, G. and Field, H.)认为对于我们的日常语言来说正确的逻辑理应是某种非古典逻辑,如某种非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 logic)<sup>①</sup>或某种三值逻辑(three-valued logic)<sup>②</sup>;而有的人却认为日常语言的逻辑理应有弗雷格在19世纪末所发展出来的古典逻辑<sup>③</sup>。使用不同的逻辑对两个语句之间是否具有逻辑蕴含关系的判定也会不同,并进而影响上述这些理论优点的权重分值。那么我们使用什么方法来决定哪一个逻辑才是我们日常语言的逻辑呢?再一次使用IBE来做出判定,这会让我们跌入丐题(begging question)的漩涡,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吗?<sup>④</sup>

这些方法论上的问题不但使得我们的哲学进步经常沦入“进十步退九步”<sup>⑤</sup>的窘境,也使得很多哲学问题在经历了两千多年以后仍没有定论。因此,从21世纪开始,哲学家们特别是形而上学家们开始反思模态工具的恰当性问题。路易斯最

为自豪的就是,我们运用模态的工具可以解释更多的哲学问题,也可以避免外延主义的一些困难。而模态革命的出现也的确表明,运用模态的工具的确可以带给我们更好的研究,借助于此,我们可以对外延主义方法不能说明的事情做进一步的精析。但是,模态理论在精析本质、本体论依赖以及反事实条件句上的失败最起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虽然模态工具要比外延主义方法更精致(fine-grained),但也显示出它不够精致。和外延主义一样,对一些现象的说明,纯粹的模态方法被证明带来了诸多反直觉的后果<sup>⑥</sup>。最近几年,哲学家们(特别是形而上学家们)基于模态工具的局限性,提出了超内涵理论(hyperintensional theory),并认为这种理论可以更好地避免模态理论面对的难题,但是,如果他们要辩护或确证这些形而上学理论,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与路易斯的模态实在论一样,就是如何解释与超内涵理论相应的认识论问题。

## Refuting Lewis's Modal Realism

WANG Cong & LIU Keyi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A significant problem facing David Lewis' Modal Realism is to provide a corresponding modal epistemology. Lewis presented two arguments in defense of his epistemology of modality, i.e. the argument based on the analogy with mathematics, ABAM, and the argument based on theoretical utility, ABTU. After analyzing it, we conclude that these two arguments of Lewis do not achieve his purpose. Moreover, one of the biggest difficulties is the IBE method used by Lew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BE is not a truth-conductive approach and the logical issues behind IBE, we further refute both of Lewis' arguments.

**Key words:** Lewis; Modal Realism; Epistemology of Modality; hyperintension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Priest, G. *In Contradiction: A Study of the Transconsistent*,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Clarendon Press, 2006.

②Field, H. *Saving Truth from Parado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Williamson, T. "Semantic Paradoxes and Abductive Methodology", in Armour-Garb, Bradley (eds.), *Reflections on the Li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325-346.

④王文方:《对哲学的与逻辑的反例外论的质疑》,《哲学与文化》2023年第2期。

⑤Williamson, T. *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Wiley-Blackwell, 2007, p. 7.

⑥Nathan Wildman. "From Modal to Post-Modal Metaphysics", in Ricki Bliss & JTM Miller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etametaphys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71-82.